

杜勇◎著

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与国家结构

ZHONGGUO ZAOQI GUOJIA DE XINGCHENG
YU GUOJIA JIEGOU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杜勇◎著

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与国家结构

ZHONGGUO ZAOQI GUOJIA DE XINGCHENG
YU GUOJIA JIEGOU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/杜勇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 - 7 - 5161 - 1867 - 2

I. ①中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国家起源—研究—中国②奴隶社会—国家结构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D691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98195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王 茵
特约编辑 崔芝妹
责任校对 王雪梅
责任印制 王炳图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5
插 页 2
字 数 245 千字
定 价 4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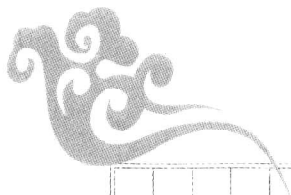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

天津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

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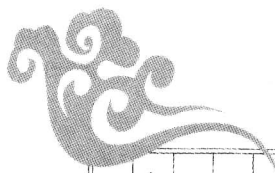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教授的新著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》即将付印，蒙他不以全稿，力囑写一小序。我绎读之下，深感这是通论先秦历史的好书；多有精辟见解，因而愿在这里赘言几句。

熟悉先秦史这一学科分支的读者，对杜勇教授的大名不会陌生。他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专著《〈尚书〉周初八诰研究》，已成为有关范围学者的必读书。那部书的特点是分析细密、论证周详，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，但我要说，该书特殊优长之处，在于书中贯穿的方法论观点。尤其是其“绪论”部分关于考证作为研究基本方法之一的论说，要言不繁，却又针对一些流行意见，很值得注意。

至于杜勇教授这部新书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》，所涵盖时代更广，牵涉问题更多，可是我以为特别值得提出的，仍然是

20 × 20 = 400





作者关于研究方法的见解。请容许我在这里建议,读者看这部书应先关注其中涉及方法论的部分。比如书的第二章第一节“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”,看来似若只是论述夏代这一具体朝代,实际上则包含着作者对古史研究方法的一系列看法。读者先看了这一部分,对杜勇教授在全书中采取的途径,以及所达成的结果,就容易认识和理解了。

中国的古史研究,自二十世纪前期即是学术界关切的热点课题。1923年以来风靡一时的“古史辨”疑古思潮,1925年王国维先生提出的“古史新证”,以及后来李济先生提出的“古史重建”,归根结底都环绕着方法论问题。杜勇教授在谈夏朝是否存在时说:“我以为,要解决这个问题,先不妨在方法论上作些检讨,或可消却心中的疑云。就夏史研究来说,有两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反思:一是如何看待晚出文献资料的真实性问题,二是如何对待夏代考古资料有无文字的问题。”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扩大为整个古史研究的方法论





问题。

杜勇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赵光贤先生的高弟。2010年出版的《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收有他的《悼念吾师赵光贤先生》一文，文中说：“先生治学，理论上高屋建瓴，考证上疑信有据，始终贯穿着求真的科学精神”，读杜勇教授的书，他在这方面确实可谓克绍箕裘了。

李學勤

2013年7月24日



序

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教授的新著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》即将付印，蒙他示以全稿，力嘱写一小序。我绎读之下，深感这是通论先秦历史的好书，多有精辟见解，因而愿在这里赘言几句。

熟悉先秦史这一学科分支的学者，对杜勇教授的大名不会陌生。他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专著《〈尚书〉周初八诰研究》，已成为有关范围学者的必读书。那部书的特点是分析细密，论证周详，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，但我要说，该书的特殊优长之处，在于书中贯穿的方法论观点。尤其是其“绪论”部分关于考证作为研究基本方法之一的论说，要言不繁，却又针对一些流行意见，很值得注意。

至于杜勇教授这部新书《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》，所涵盖时代更广，牵涉问题更多，可是我以为特别值得提出的，仍然是作者关于研究方法的见解。请容许我在这里建议，读者看这部书应先关注其中涉及方法论的部分。比如书的第二章第一节“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”，看来似若只是论述夏代这一具体朝代，实际上则包含作者对古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系列看法。读者先看了这一部分，对杜勇教授在全书中采取的途径，以及所达成的结果，就容易认识和理解了。

中国的古史研究，自二十世纪前期即是学术界关切的热点课题。1923年以来风靡一时的“古史辨”疑古思潮，1925年王国维先生提出的“古史新证”，以及后来李济先生提出的“古史重建”，归根到底都环绕着方法论问题。杜勇教授在谈夏朝是否存在时说：“我以为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先不妨在方法论上作些检讨，或可消却心中的疑云。就夏史研究来说，有两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反思：一是如何看

待晚出文献资料的真实性问题，二是如何对待夏代考古资料有无文字的问题。”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扩大为整个古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。

杜勇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赵光贤先生的高弟。2010年出版的《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收有他的《悼念吾师赵光贤先生》一文，文中说：“先生治学，理论上高屋建瓴，考证上疑信有据，始终贯穿着求真的科学精神”，读杜勇教授的书，他在这方面确实可谓克绍箕裘了。

李学勤

2013年7月24日

目 录

上编 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

第一章	五帝时代形成中的贵族国家联盟	(3)
一	从阪泉之战看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	(3)
二	炎帝神农氏的源起与扩张	(13)
三	蚩尤非东夷考	(22)
四	从陶寺文化看尧舜部落联合体的性质	(31)
第二章	夏朝统一贵族国家的形成	(41)
一	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	(41)
二	夏朝国家形式及其统一的意义	(50)
三	大禹治水广为流布的缘由	(73)
四	夏朝夷夏关系新说	(83)
第三章	商朝统一贵族国家的发展	(91)
一	商朝统一贵族国家的建立	(91)
二	商朝国家结构新论	(107)
三	商朝政区蠡测	(133)
四	夏商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	(153)

下编 三代贵族国家体制下的附庸国

第四章	杞与莒	(161)
一	杞国的东迁及其他	(161)
二	古文字中“莒”字的鉴别问题	(169)
三	莒国亡年辨	(175)
第五章	徐与晋	(181)
一	从班簋的年代看徐偃王的事迹	(181)
二	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问题	(194)
三	“上大夫受县,下大夫受郡”新解	(202)
第六章	巴与蜀	(210)
一	甲骨文中的巴方	(210)
二	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	(219)
三	《禹贡》梁州相关诸问题	(226)
后记		(236)

上 编

早期国家的形成
与国家结构

第一章

五帝时代形成中的贵族国家联盟

一 从阪泉之战看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

关于炎黄阪泉之战较为完整的记载，首推司马迁的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。该篇云：

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。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诸侯咸来宾从。而蚩尤最为暴，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诸侯，诸侯咸归轩辕。轩辕乃修德振兵，治五气，艺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，教熊罴貔貅羆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。三战，然后得其志。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。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禽杀蚩尤，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，代神农氏，是为黄帝。

在这段文字中，司马迁使用了后世才有的若干用语。如所谓“天子”并非后世王天下的国家最高统治者，而是当时的部落联合体领袖；“诸侯”亦非某位古帝以祚土授民的方式分封的，而是加盟联合体的部落首领；又如“修德”、“征师”之类，亦为国家时代的政治风格。这些解读所反映的，只代表当时人们对远古历史的认识水平，科学与否不必深究。这里只就炎黄阪泉之战的真实性及其意义问题谈点看法，希望有助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讨。

(一)

司马迁在写作《五帝本纪》时，除主要依据孔子所传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外，所能看到的材料当比今人所见为多，如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”者当属此类，而“择其言尤雅者”入书，也通过游历各地（包括北过涿鹿），采访长老口碑博加考验，以为“不离古文者近是”。太史公治史态度的严谨，使《五帝本纪》成为关于炎黄史事的权威性记载。但是，《五帝本纪》的成篇相对于真正的五帝时代来说，毕竟相距两三千年了，即使更早记述炎黄史事的先秦文献因为不是当时的记录，也同样应归于传说范畴。对于传说中的古史真实性问题，今日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。这个问题笔者有另文涉及^①，不在此处讨论。总的看法是，无论零星的或经过综合化整理的晚出文献，实际上都以口述史学的形式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远古时代的史影，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，我们不能因为不是当时留下的记录就一笔抹杀其史料价值。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我们对炎黄阪泉之战的讨论才有意义。

那么，关于炎黄阪泉之战的真实性问题又该从何说起呢？从相关文献来看，炎黄阪泉之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广泛流传，似非司马迁向壁虚构。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说“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”；银雀山汉墓竹简《孙子兵法》佚文：“黄帝伐赤帝”，“战于反（阪）山之原”；《国语·晋语四》说炎黄“二帝用师以相济（挤）”，这些均表明炎黄阪泉之战有较充分的文献依据，不可轻易怀疑。但我们这里要说的阪泉之战的真实性问题并非指此，而是就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的关系而言的，即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是两次不同的战争，还是同一次战争故事的分化讹传。

除《五帝本纪》外，《战国策·秦策》也提到“黄帝伐涿鹿，而禽蚩尤”。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，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完全是两次不同的战争，前者是炎黄之间的角逐，后者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争战，泾渭分明，毫不混同。对此产生怀疑者，似自清儒始。崔述《补上古考信录》说：黄帝、炎帝“必无同胞兄弟用师以相攻之理”，

^① 杜勇：《关于历史上是否存在夏朝的问题》，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4期。

“《晋语》此文，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，而假托于古之圣人”。崔氏以伪托立说，从根本上否定了阪泉之战的存在。另一种看法是把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混为一谈，如梁玉绳在《史记志疑》中说：“然则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，是轩辕勤王之师，而非有两事，故《逸周书·史记解》称蚩尤曰阪泉氏，斯为确证。”对清儒这些看法，今日学者颇有赞同者，并益以二战同地为证，以助清儒之说。如刘起釞先生即谓：“而传说中又有黄帝与赤帝的阪泉之战，始见于《大戴记·五帝德》，《五帝本纪》载此事，改‘赤’为‘炎’。以炎为南方赤，是阴阳五行说盛行后的事，此传说之后起甚明。炎黄两族为婚姻之族，共同携手向东发展，正如周之姬、姜，辽之耶律氏与审密氏及金、元、清之王室固定氏族一样，世代亲密，不至自相火拼。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据《逸周书·史记解》称蚩尤为阪泉氏，论定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。按，《水经注》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，是阪泉与涿鹿为一地，足证梁氏之说正确。可知传说中本来只有涿鹿之战，阪泉之战是故事分化讹传而成。”^①这就牵涉阪泉之战的真实性问题，有必要对各家所持证据略作辨析。

其一，关于互通婚姻之族是否可能发生自相火并的问题。据《国语·晋语四》记载：

昔少典娶于有蟠氏，生黄帝、炎帝。黄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。成而异德，故黄帝为姬，炎帝为姜。二帝用师以相济也，异德之故也。异姓则异德，异德则异类。异类虽近，男女相及以生民也。

这里说到炎黄二帝同为少典氏的后裔，是从同一母族中分化出来的两个氏族或部落，久居异地，成而异姓，一直保持着互通婚姻的关系。但也有“二帝用师以相济”的时候，此即其他文献所说的阪泉之战。韦昭注云：“济当为挤。挤，灭也。传曰：‘黄帝战于阪泉。’”这里的

^① 刘起釞：《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》，载《古史续辨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56页。

“济”当从韦注，似不宜释为救援，^①因为“用师”即兵戎相见，恐非救援可解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炎黄二帝既为互通婚姻之族，是否就没有兵戎相见的可能呢？崔述不以同胞兄弟解炎黄二帝的关系固然可取，但说同胞兄弟必无用师相攻之理则不然。周初的“三监之乱”、唐初的“玄武门之变”，即属于同胞兄弟间的武装对抗。这种兄弟阋墙、同室操戈的政治事件，在历史上真是司空见惯。至于史前社会特别是向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，社会生产力和社会道德水平还很低，由于生存危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，使获得财富成为各部族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，“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是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”^②。所以不同氏族或部落之间，哪怕是具有一定血缘联系的氏族或部落之间，因为生存危机带来的利益冲突导致战争发生，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。即使在后来的文明时代，此类事件也是一再上演。还是以姬姜两族为例吧。众所周知，周为姬姓，其男性始祖是被称为后稷的弃，弃的母亲即是有邰氏之女姜嫄。其后古公亶父娶太姜，周武王娶邑姜，直至周代之亡，姜姓族始终是姬周主要的互通婚姻之族。但西周末年作为姜姓的申侯，因为对幽王“废申后，去太子”不满，遂联合缙及犬戎攻破镐京，逼使周室东迁洛邑。这可以说是姬姜二姓之间发生的又一次“阪泉之战”。可见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，互为婚姻之族仍有发生战争的可能。

其二，关于蚩尤是否阪泉氏的问题。《逸周书·史记解》说：“昔阪泉氏用兵无已，诛战不休，并兼无亲，文无所立，智士寒心，徙居至于独鹿，诸侯畔之，阪泉以亡。”这段话中的“阪泉氏”，颇有些“天子”气象，故可谓“诸侯畔之”，但蚩尤只是一个“不用帝命”的角色，未见有似“天子”一样的地位。而且，代炎帝神农氏为天子者是黄帝，而黄帝又是在“禽杀蚩尤”之后才成为部落联合体的领袖的，这里根本就没有蚩尤号令天下的历史空间。此外，阪泉氏既号阪泉，当与其久居阪泉有关，可是文献中并无蚩尤居阪泉或涿鹿的记录。《逸周书·尝麦解》说：

① 赵世超：《炎帝与炎帝传说的南迁》，载《轩辕黄帝与缙云仙都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② 恩格斯：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，载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，第160页。